

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工程學術出版資助項目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庫 · 歷史考古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禮與中國古代社會

RITUAL AND SOCIETY IN ANCIENT CHINA

秦漢魏晉南北朝卷

—
吳麗娛
主編
—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工程學術出版資助項目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庫 · 歷史考古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禮與中國古代社會

RITUAL AND SOCIETY IN ANCIENT CHINA

秦漢魏晉南北朝卷

吳麗娛 主編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禮與中國古代社會 (全四卷) / 吳麗娛主編.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 - 7 - 5161 - 3558 - 7

I. ①禮… II. ①吳… III. ①禮儀—研究—中國—古代 IV. ①K892. 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265755 號

出版人 趙劍英
責任編輯 顧世寶 黃燕生
責任校對 林福國 董曉月
責任印製 戴 寬

出版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樓西大街甲 158 號
郵編 100720
網址 <http://www.csspw.cn>
發行部 010 - 84083685
門市部 010 - 84029450
經銷 新華書店及其他書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裝訂 廊坊市廣陽區廣增裝訂廠
版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開本 710 × 1000 1/16
印張 106.25
插頁 2
字數 1800 千字
定價 398.00 元(全四卷)

凡購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圖書,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本社營銷中心聯繫調換
電話:010 - 84083683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
历史考古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庫》出版說明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庫》（全稱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研究課題成果文庫》）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組織出版的系列學術叢書。組織出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庫》，是我院進一步加強課題成果管理和學術成果出版的規範化、制度化建設的重要舉措。

建院以來，我院廣大科研人員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雙重探索中做出了重要貢獻，在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智力支持和各學科基礎建設方面，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每年完成的專著類成果就有三四百種之多。從現在起，我們經過一定的鑒定、結項、評審程序，逐年從中選出一批通過各類別課題研究工作而完成的具有較高學術水平和一定代表性的著作，編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庫》集中出版。我們希望這能夠從一個側面展示我院整體科研狀況和學術成就，同時為優秀學術成果的面世創造更好的條件。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庫》分設馬克思主義研究、文學語言研究、歷史考古研究、哲學宗教研究、經濟研究、法學社會學研究、國際問題研究七個系列，選收範圍包括專著、研究報告集、學術資料、古籍整理、譯著、工具書等。

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

2006年11月

本卷作者

楊 英 楊振紅 梁滿倉 袁寶龍

本卷目錄

第一章上 秦漢章(上)	楊 英(1)
第一節 西漢國家祭祀禮的變化	(2)
一 漢武帝立“太一”前的西漢國家祭祀	(5)
二 “太一”的出現及漢武帝時的國家祭祀格局	(15)
三 “太一”的遷徙及其他雜祀的調整	(28)
四 “元始故事”中的郊祀	(47)
第二節 東漢國家郊祀格局的定型	(63)
一 東漢的郊壇形制和國家祀典	(65)
二 東漢郊天禮的儀式	(80)
小結	(82)
第三節 秦與兩漢封禪——皇帝親祀的國家大典	(84)
一 封禪溯源——從封禪雜說到帝王之禮	(85)
二 漢武帝的封禪——皇帝制度下的國家盛典	(96)
三 讖緯影響下的國家大禮——光武帝的封禪	(103)
小結	(110)
第一章下 秦漢章(下)	楊振紅(112)
第四節 秦漢時期的“禮”、“法”觀念及其法律體現	(112)
一 出土秦漢律所反映的差異性原則及其源流	(116)
二 秦漢律的基本框架、原則和內容為商鞅所確立	(138)
三 儒、法兩家的禮法觀及其本質差異	(146)
小結	(155)
第五節 月令與秦漢政治	(156)

一	出土秦漢律令與月令	(157)
二	月令與秦漢政治	(170)
小結	(189)
第二章	魏晉南北朝章	梁滿倉 袁寶龍(192)
第一節	三禮之學的興起與興盛	(194)
一	《周禮》地位的提高與三禮之學的形成	(194)
二	禮學的實用價值	(202)
三	禮學的發展與興盛	(209)
四	官學在禮學發展中的作用和地位	(218)
五	學術交流對禮學發展的推動作用	(239)
第二節	五禮制度化的進程及意義	(246)
一	五禮制度化	(246)
二	五禮制度發展的三個階段	(250)
三	五禮制定的原則——師古適用	(268)
四	五禮的實踐及其作用	(274)
五	五禮制度化的原因及意義	(289)
第三節	西晉、北魏的三年之喪	(301)
一	西晉恢復三年之喪制度	(301)
二	魏孝文帝實行三年之喪制度	(307)
三	西晉、北魏實行三年之喪的意義	(315)
四	三年心喪與喪服制度實踐	(322)
第四節	世家大族與國家禮制	(334)
一	世家大族參與國家禮制建設的外部條件和內部因素	(334)
二	世家大族對國家禮制建設的參與和推動	(347)
三	世家大族對國家禮制建設的制約	(360)
結語	(370)
附錄	(371)
一	表格目錄	(371)
二	插圖目錄	(371)
參考文獻	(373)

第一章上 秦漢章(上)

秦漢時期，中國在經歷了春秋戰國的巨大社會變革之後，建立起中國歷史上最初始的統一的以皇帝為中心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官僚制國家，並奠定了此後中國兩千年帝制國家的基本形態和框架。這一重大歷史轉型，相當程度上以“禮”的變遷來體現和表徵，最為顯著的例子即，對於春秋以來的社會巨變，歷史上甚至當時人都以“禮崩樂壞”或“禮壞樂崩”來定性和歸結。事實確實如此，春秋戰國至秦漢時期，“禮”在政治、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各種禮儀制度，特別是人們對“禮”的觀念都發生了重要變化。因此，研究秦漢時期的“禮”，從根本上來說，便是探究這些變化的動因、過程及其表現形式，所謂表現形式即具體的禮儀制度。這意味著我們所要探究的秦漢時期的“禮”，並非僅僅局限於狹義的具體的禮儀制度，而是深植於社會之中的廣義的“禮”。

如果將秦漢時期“禮”研究的範疇做如上界定，就會發現我們的視野隨之極大拓展，很多以往被歸之為思想史、經學史、政治史、法制史甚至文獻學的課題都將成為我們研究的重要內容。例如，《儀禮》、《禮記》、《周禮》“三禮”的成書、經典化及其歷史背景，戰國秦漢時人關於“禮”與“法”的爭論，秦漢時期國家祭祀禮的建立及其演變等，均與戰國秦漢時人“禮”觀念的變遷以及國家觀的形成密切相關。由於篇幅的限制，本章無法對秦漢時期的“禮”展開全面的系統的討論，而祇選擇了兩漢時期國家祭祀禮的發展演變，秦漢時期的“禮”、“法”觀念及其法律體現，月令與秦漢政治等幾個問題，進行專題式的討論，以此管窺秦漢時期“禮”在國家政治、社會中的地位及其影響，探討“禮”觀念以及相關禮儀制度的內容、變遷及其動因。關於本章所探討的問題，以往學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這些成果是本章展開論述的基礎和前提。以下即將本章分為

上、下兩部分展開論述，學界的成果也將分別予以介紹。

第一節 西漢國家祭祀禮的變化

秦漢時期，國家祭祀禮的發展，經歷了從崩析到重建及逐漸定型的過程。一方面，由於《詩》、《書》的焚毀，宗周舊禮衰落；另一方面，由於繼承戰國以來重視律令的傾向，起初禮的建設似乎尚未提上日程。但是，以皇帝為中心的大一統帝國建構和運行演進過程中的需要，致使各種禮儀從經書的記載登入廟堂實踐，最終導致了國家祭祀禮的定型。

關於秦漢國家祭祀的研究此前已經有了許多值得稱道的作品。近年來，大陸學者在秦漢國家祭祀禮領域取得了不少進展，如詹鄞鑫《神靈與祭祀——中國傳統宗教總論》^①、王柏中《神靈世界：秩序的建構與儀式的象徵——兩漢國家祭祀制度研究》^②、楊英《祈望和諧——周秦兩漢王朝祭禮的演進及其規律》^③、湯貴仁《泰山封禪與祭祀》^④、何平立《巡狩與封禪——封建政治的文化軌迹》^⑤、郭善兵《中國古代帝王宗廟禮制研究》^⑥等，反映了大陸學者在秦漢禮制研究方面的進步。但其中細節領域挖掘不夠，注意到制度發展變化及其政治、文化背景的較少，且對宗教學、政治學在禮儀研究方面的運用尚屬於初級階段。也有的大陸學者以“國家宗教”的概念進行研究，王青《西漢國家宗教的發展與演變》認為漢武帝建立太一、后土之祠是重建國家宗教的表現^⑦；張榮明《中國的國教：從上古到東漢》用“功能性”概念解釋國家宗教性質^⑧，認為國家組織即宗教組織，並試圖將這一觀點形成體系。鄒昌林《中國古代國家宗

① 詹鄞鑫：《神靈與祭祀——中國傳統宗教總論》，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② 王柏中：《神靈世界：秩序的建構與儀式的象徵——兩漢國家祭祀制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③ 楊英：《祈望和諧——周秦兩漢王朝祭禮的演進及其規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

④ 湯貴仁：《泰山封禪與祭祀》，濟南：齊魯書社2003年版。

⑤ 何平立：《巡狩與封禪——封建政治的文化軌迹》，濟南：齊魯書社2003年版。

⑥ 郭善兵：《中國古代帝王宗廟禮制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⑦ 王青：《西漢國家宗教的發展與演變》，《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3期。

⑧ 張榮明：《中國的國教：從上古到東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

教研究》則試圖超越“儒教是否為宗教”這一聚訟紛紜的問題^①，而從中國文化的本質特性來探討中國古代宗教問題的本源，作者認為中國文化的根本特徵是禮，宗教亦整體從屬於禮，並以《周禮》為切入點，考察了國家宗教的結構、功能、價值系統等，這體現了作者從高處著眼以把握事實的孜孜努力，是直至目前為止以“國家宗教”為概念進行研究最為深入的作品。

日本學者是將祭祀禮作為統一帝國和皇帝制度的一部分來認識的。其中金子修一有多篇論著，內中《以皇帝祭祀為視角解讀漢代歷史》探索了皇帝祭祀或帝位繼承禮儀的變遷^②，指出儒教的祭祀創設於漢代。他的兩部代表作《古代中國と皇帝祭祀》和《中國古代皇帝祭祀の研究》也以即位和郊廟禮為中心，詳細探討了漢唐時期國家禮儀和皇帝祭祀的問題^③。小島毅《郊祀制度の變遷》對秦漢郊祀制度作了介紹^④，而後他的《天子と皇帝——中華帝國の祭祀體系》則從皇帝制度的角度考察了祭祀禮與天子這一名號和皇帝制度的關係^⑤。渡邊信一郎的視角更為宏闊，他的《中華帝國・律令法・禮の秩序》從律令與禮的關係來考察禮制^⑥，而近年出版的《中國古代の王權と天下秩序》也有專門章節講到漢唐時期的郊祀禮^⑦。鷲尾祐子《前漢郊祀制度研究序說——成帝時郊祀改革以前について》通過對成帝以前郊祀的比較探討西漢郊祀制度^⑧，認為以方

① 鄭昌林：《中國古代國家宗教研究》，北京：學習出版社2004年版。

② [日]金子修一：《以皇帝祭祀為視角解讀漢代歷史》，大東文化大學《漢學會志》43，第427—448頁。

③ [日]金子修一：《古代中國と皇帝祭祀》，東京：汲古書院2001年版；《中國古代皇帝祭祀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2006年版。

④ [日]小島毅：《郊祀制度の變遷》，《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東京：吉川弘文館1989年版，第123—219頁。

⑤ [日]小島毅：《天子と皇帝——中華帝國の祭祀體系》，收入松原正毅編《王權の位相》，京都：弘文堂1991年版。

⑥ [日]小島毅：《中華帝國・律令法・禮の秩序》，收入川北稔、鈴木正幸編《シンポジウム 歴史學と現在》，東京：柏書房1995年版。

⑦ [日]渡邊信一郎：《中國古代の王權と天下秩序》第五章，東京：校倉書房2003年版，第181—206頁。

⑧ [日]鷲尾祐子：《前漢郊祀制度研究序說——成帝時郊祀改革以前について》，立命館東洋史學會中國古代史論叢編集委員會編：《中國古代史論叢》，京都：立命館東洋史學會，2004年，第1—32頁。

士、巫祀爲主導向以皇帝、官僚爲主體的循序變化，西漢政權呈現了祭政一體、皇帝特權化的傾向。此外岩野忠昭撰文，則根據《春秋繁露》探討了西漢後期的郊祀問題^①。

以上研究注重分析傳統史料，有不少是採用了“儒教”的概念。武內義雄《儒教的精神》^②、宇野精一《儒教思想》^③、加地伸行的《論儒教》^④等對此都有宏觀性的綜論。歷代王朝的禮儀也被看作是儒教的具體表現形式，上述學者在考察“禮”時無不注意到禮儀的政治背景，以及禮儀活動於皇帝和國家政治生活的互動關係等，因此可以認爲，日本的禮儀研究是在政治史、古代中國的精神傳統等領域研究基礎上進行的。

近幾十年來，臺灣學術界對“禮”的研究引入社會學、政治學概念，更關注禮與政權之間的關係。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注重皇權、禮儀之間的互動^⑤，在考察政治史的同時，論述秦漢國家祭祀禮的發展狀況及性質，是臺灣學術界近年禮儀研究的代表作。高明士《皇帝制度下的廟制系統——以秦漢至隋唐作爲考察中心》^⑥，對秦漢廟制作了考察，並認爲廟制的建立和完善與皇帝制度確立有關係，而他在《中國中古政治的探索》自序中指出，“以漢唐間爲‘中古’的時代區分，主要是著重於儒教的治國原理建立與實施，期以建立禮制世界”^⑦，也採用了“儒教”這一概念。在國家祭祀禮是不是宗教的討論尚未定論的情況下，臺灣學者試圖對“宗教”一詞作重新詮釋，爲解釋國家祭祀的性質提供基礎，如陳熙遠《“宗教”——一個近代文化史上的關鍵詞》^⑧、蔡宗憲《淫祀、淫祠与祀典——漢唐間幾個祠祀概念的歷史考

① [日] 岩野忠昭：《論西漢後期的郊祀》，東洋大學《中國哲學文學科紀要》，第12頁。

② [日] 武內義雄：《儒教的精神》，東京：岩波書店1982年版。

③ [日] 宇野精一：《儒教思想》，東京：講談社1984年版。

④ [日] 加地伸行：《論儒教》，于時化譯，濟南：齊魯書社1993年版。

⑤ 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08年版。

⑥ 高明士：《皇帝制度下的廟制系統——以秦漢至隋唐作爲考察中心》，《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1993年第40期，第53—96頁。

⑦ 高明士：《中國中古政治的探索》自序，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5頁。

⑧ 陳熙遠：《“宗教”——一個近代文化史上的關鍵詞》，《新史學》2002年第13卷第4期，第37—66頁。

察》^①等，可以看出較早吸收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的臺灣學術界試圖努力找出適合古代中國的話語詞彙，以研究中國古代祭祀禮。

但是，以“國家宗教”來定性秦漢時的郊祀和封禪禮，並未成為定論。對中國本土學者而言，“儒教”這個概念亦尚未被廣泛接受，其內涵和外延尚有待於進一步明確化。

西漢的國家祭祀，遠承周代郊天禮，近接秦統一之後的國家祭祀。然而，周代郊天禮是與祭祖、朝聘、喪葬等其他禮典共存於整體的周“禮”體系中的^②，隨著周“禮”的崩壞，統一的體系蕩然無存，由周天子主持的祭祀禮（如郊天）湮廢，各諸侯國的地方性祭祀大大發展，人們心目中的神靈世界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民間自發的禱祠大興。秦的崛起和統一改變了周代以來的政治格局，但秦的國家祭祀仍承接其諸侯時期的故舊——以四色帝時為主。西漢時期，隨著文化的統一、經學的發蒙，國家祭祀禮的面貌發生了深刻變化，先是漢武帝時期太一、后土祠的建立和神仙方術、雜祀大量進入廟堂，而後元帝時匡衡改革，整理了與神仙方術有關的雜祀，國家祭祀纔開始出現合乎經書記載的格局。可以這樣認為，西漢一朝國家祭祀的變化，經歷了由承秦而來的粗淺內容到改變性質、成為正統禮典的過程。其中，武帝立太一祠是西漢國家祭祀的分水嶺，前後分為兩個階段。下文首先考察武帝立太一之前西漢國家祭祀禮的情況。

一 漢武帝立“太一”前的西漢國家祭祀

西漢初年的國家祭祀幾乎完全繼承秦代。高祖二年（前205）於郊雍立北時，再加上沿襲秦的雍四時，成為雍五時。高祖六年，又於長安立祠官、女巫。總地說來，漢初國家祭祀領域大致可分為雍五帝時、長安祠官領有之祠、社祠三大類，下文分別考察。

（一）漢初的雍五帝時

雍五帝時是漢初最尊貴的神靈，源自秦諸侯時期的祭祀，與秦的雍四

^① 蔡宗憲：《淫祀、淫祠與祀典——漢唐間幾個祠祀概念的歷史考察》，《唐研究》第13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03—232頁。

^② 依筆者的看法，“禮”可以分為禮典、物化禮樂兩大類。禮典是承擔著軍政、外交、道德倫理、社會生活等各種實際功能的典禮，《周禮》分為吉、凶、軍、賓、嘉五類。物化禮樂則是宮室車馬、衣服旌旗、列鼎鋪簋、金石雅樂等的定制。它們的內容極其具體而嚴格，郊天、祭祖禮也有這些內容規定，它們均是整體“禮”的一部分。見楊英《祈望和諧——周秦兩漢王朝祭禮的演進及其規律》，第46—48頁。

時比僅增加了北時。《漢書·郊祀志》記載增加的過程道：高祖二年（前205）劉邦入關，問起故秦時祭祀上帝為何帝，回答是白、青、黃、赤四色帝。劉邦繼而問道：“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在眾人“莫知其說”的情況下，劉邦便提出“乃待我而具五也”^①，並將自己作為黑帝加入四色帝系統之中，由於北方對應的色是黑色，因此黑帝祠被命名為北時。這樣，漢的雍五帝時便完備了。

如果對秦四色帝時變成漢五色帝時的過程作些細究，可以發現漢初五色帝時取代秦的四色帝時，並不是簡單地增加了一處祭祀，而有五行、五德、符運等觀念逐漸滲入國家祭祀的原因。具體說來，秦的四色帝時與符運、五德說尚未發生聯繫——秦的四色帝時始自秦襄公7年（前771）立西時，到獻公18年（前366）立櫟陽畦時，四色帝時完備。從雍四色帝時與秦朝符運的關係看，畦時建立的緣由是秦獻公時“櫟陽雨金”，獻公自以為得金瑞，便在天上掉金的櫟陽立畦時祭祀白帝，這樣，畦時對應的是金。但秦始皇統一後自認為秦為水德，二者不相符，顧頡剛先生因此認為西、畦兩時是西漢末年的人為了證明漢為火德，所勝為秦“櫟陽雨金”之金德而偽造的^②。但西、畦兩時並非漢人的偽造，至於這兩時對應的是金，而秦的德為水德，二者不相符，是因為秦獻公時期五德終始說和五行相次轉用事說尚未融合^③，更不用說對國家祭祀發生影響。

隨著戰國數術的發達，五德終始說和五行相次轉用事說結合在一個體系中。至遲到鄒衍，二者已經融合。《漢書·藝文志》陰陽家有《鄒子終始》五十六篇^④，《史記·封禪書》“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集解》如淳曰：“今其書有《主運》。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面為服。”^⑤則《主運》為騶子書篇名，內容為“五行相次轉用次”，此為宇宙圖式的概念。

① 《漢書》卷二五《郊祀志》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210頁。

② 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載《顧頡剛古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343—345頁。

③ 秦獻公的時代正值戰國中期——梁惠王在位為前370年至前319年，秦獻公立畦時在前366年，正是這段時間。而騶衍時代在梁惠王之後（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與歷史》，見《顧頡剛古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262—263頁），則秦獻公立畦時在騶衍以前。到騶衍時五行、五德說纔開始糅合，因此在鄒衍之前立的秦四色帝時不會受其後纔產生的鄒衍學說影響。

④ 《漢書》卷一〇《藝文志》一〇，第1733頁。

⑤ 《史記》卷二八《封禪書》，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368—1369頁。

而他的五德終始說，《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其“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則五德、五行說在鄒子學說中已經融合。至於漢高祖聽說天有五帝，是因為到高祖的時代，融時空於一體五行說已經深入人心，因此劉邦將自己作為黑帝，建立五色帝時，是五行說對國家祭祀進一步影響的結果。

漢的雍五時祭祀與秦的四色帝時相比另一個不同的地方是：秦的雍四色帝時與秦的符運——秦文公獲黑龍尚未發生關係^①，而漢的雍五色帝時已經與其符運結合。秦的符運是秦文公獲黑龍，這與秦德為水德一致，但與秦的四色帝時無關——秦四色帝時主祀的是白帝，白為西方，為金，與黑色、水德對應北方不一致，而且四色帝中根本沒有黑帝。秦獻公立畦時時代在鄒衍前，而到鄒衍時五行、五德說纔開始糅合。秦始皇雖採用五德終始說，但採用的僅是其歷史循環論，並沒有顧及五德終始說中秦的水德與雍五時中主祀的白帝對應是金不一致。到漢代，高祖劉邦建立北時，這一矛盾就沒有了。《史記·曆書》：“漢興，高祖曰‘北時待我而起’，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則北時（黑帝）之立與漢初高祖認為自己為水德有關。漢初襲了秦的德和服色，並定河決金堤為符運，《史記·封禪書》：“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曆，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是其符也。”則河決金堤與水德、尚黑又聯繫起來。這樣，漢立北時與尚黑、水德、符運便都聯繫起來，立北時祠黑帝便不僅僅是簡單的對五色帝的祭祀，而蘊含著與自己的德運聯繫並使之綿祚長久的思想。

北時的確立使五色時最終齊備。五色帝從此成了西漢國家祭祀中最尊之神，高祖二年下詔：“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上帝”即指雍五時。

漢高祖建立北時，使漢雍五時取代了秦的雍四色帝時，表面看來祇不過是增加了一處時，事實上它反映的是以五行思想為基礎的五色帝時進入了國家祭祀的範圍。因此，雍五時的建立，是戰國以來民間宗教信仰領域長期存在的五行思想向國家祭祀滲透的一個環節。這個環節是後來國家祭祀領域出現立太一、后土時等更大規模的變化的前聲。不過漢高祖未曾親自郊祀雍五時，文帝十四年（前166），因連年五穀豐登而增加雍五時所

^① 《漢書》卷二五上《郊祀志》上記秦統一後有人對始皇說：“昔文公（臘）[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第1201頁）。

供奉的車馬駕具，十六年夏，因方士公孫臣說“土德之應黃龍見”而親自郊祀雍五時。武帝在位期間親自到雍祭祀一共十次，太初之後因為新的神靈如太一、后土不斷設置，雍五時的地位下降，到成帝時匡衡改革國家祭祀，雍五時因不符合儒家經典之義，終於被清除出國家祭祀的領域，這一內容將在下文涉及。

（二）漢初長安祀官領有之祀

除了雍五時外，高祖六年在長安設立了蚩尤之祠和祠祀官、女巫，領有大量祭祀。這些是漢初祭祀的另一部分重要內容。下文便對之作些考察。

1. 蚩尤

蚩尤之祠在長安設立的由來是高祖在沛起兵時曾祀蚩尤。《漢書·高帝紀》：“高祖乃立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廷，而釁鼓旗。”顏師古注引應劭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亦古天子，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則高祖在沛祭蚩尤為的是出兵取勝。傳說蚩尤曾作兵器。《世本》“蚩尤作兵”^①，又《山海經·大荒北經》“蚩尤作兵伐黃帝”^②；《管子·地數篇》也有：“葛廬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劍、鎧、矛、戟，……雍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雍弧之戟、芮戈。”^③戰國至漢初蚩尤一向被當作主兵之神。戰國至秦，齊地八神的兵主即祠蚩尤^④，高祖則在得天下後將保佑自己的蚩尤立祀於長安。

蚩尤之祀與兵家、星占術關係密切。《漢書·藝文志》兵形勢家有《蚩尤》兩篇，“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史記·天官書》：“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高祖起兵祀蚩尤亦取其制敵之意，由此更可看出，戰國以來數術的發展大大豐富了人們造神的想象力。

2. 后稷

高祖六年（前201）立靈星祠祀后稷，《三輔故事》云長安城東十里

①（漢）宋衷注，（清）秦嘉謨等輯：《世本八種》，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年版，第359頁。

②袁珂：《山海經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版，第490頁。

③黎翔鳳：《管子校注》下，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355頁。

④《史記》卷二八《封禪書》記載的齊地八神中第三是兵主。“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第1367頁。

有靈星祠。王先謙《漢書補注》（以下簡稱《補注》）注《郊祀志》引《漢舊儀》：

五年修復周家舊祠，祀后稷於東南，爲民祈農報闕功，夏則龍星見而始雩。龍星左角爲天田，右角爲天庭。天田爲司馬，教人種百穀，爲稷。靈者，神也。辰之神爲靈星，以壬辰日祠靈星於東南，金勝爲土相也。^①

“龍見而雩”見於《左傳》桓公五年（前707）。龍爲天空中之東宮蒼龍，即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之總稱，其角分左角、右角。《史記·天官書》：“左角，李；右角，將。”《索隱》：“李即理，法官也。……又《石氏》云：‘左角爲天田，右角爲天庭。’”則《漢舊儀》、《史記·天官書》與《石氏》皆以天田、天庭爲東方蒼龍之不同區域的名稱，不過所附會的神不同：《天官書》附會的是理官，《漢舊儀》附會的是后稷。其實此前周代的后稷之祀與星辰尚無關係，《禮記·祭法》：“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②后稷是周之祖先，因善於播殖受祀，到《漢舊儀》中，后稷與龍之右角天田附會在一起，《天官書》則將理官與天田聯繫起來，可以看出在戰國數術廣泛流播後，民間重視生產的星占數術與傳自歷代王官、重視政治秩序的星占術尚有不同。后稷與龍星的附會是戰國天文數術與民間對農業生產的重視結合的結果。

3. 長安祠官領有的其他祭祀

高祖六年（前201）在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巫分爲梁巫、晉巫、秦巫、荆巫、九天巫、河巫、南山巫，各領有一些祭祀。《史記·封禪書集解》引文穎曰：

巫，掌神位之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祠祝者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爲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樑，故有梁巫。後徙豐，豐

①（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520—521頁。

②《禮記正義》卷四六，（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590頁中欄。